

3月4日上午，得知周先生离世的消息，悲痛之情，顿涌心头，一时之间，不愿相信已成事实。脑海中那张笑脸，一下子又把时光拉到了初次认识她的1984年。那年夏天，她的学生张建一参加国际比赛获得金奖，浙江省文化厅要开庆功会，我随周小燕、张骏祥到杭州采访。庆功会的情景已经模糊，但在西湖边散步时，她对我说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：“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，你看着啊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，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光的。”那个年代，在国际比赛中获奖，还是很稀罕的事情，还是很稀罕的事情，所在单位甚至会给予优先分配住房的奖励。周先生说这番话时，神清气爽、满脸自信的样子，深深地感染了我。还记得在一旁的张骏祥，也似颇有心灵感应地点头称是。时间，证实了周先生的预言。中国音乐界的年轻一代，后来接连不断地在国际舞台摘金夺银。在他们的背后，正是站着一批像周先生这样辛勤的园丁，才能在各个音乐领域全面开花。

此后，每次见到周先生，都会打个招呼。尤其是去听音乐会时，只要看到她在场，中场休息或者演出结束时，总想听听她的点评。有一次到上海音乐厅听完一台声乐音乐会，站在延安路人行道上，针对演员表现，她给我讲了很多气息运用、发声位置、风格把握等等专业评价。见我拿出笔记本要记录，她笑吟吟地说：“你也不用原封不动地记下

去年，我们一家游玩莫干山时住在林海别墅。在莫干山数百幢有故事的老别墅里，林海别墅以两幢风格迥异的中西小楼联壁而成为外界称道；尤其是左边那幢中式殿堂，飞檐挑角、雕梁画栋，一派旧意古趣。殿堂正面二十扇落地长窗上，刻花描凤，镶嵌着全套《西厢记》故事。覆盖着黄色琉璃瓦的屋顶上，更是雕龙塑狮，金碧辉煌。那晚，我们在中式殿堂用餐时，发现最夺人眼球的当推大堂内悬挂着的两块“匾”：一块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题写的“百忍堂”，一块是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题写的“风月无边”。

莫干山上看风月

顾定海

据林海别墅工作人员介绍，这两块匾额包括餐厅上方依然在使用的多台古色古香铜吊灯架，都是当年的旧物。“文革”期间群众为保留这些东西，想了很多办法，才让大家今天依然能一睹历史的“原件”。

林海别墅原为旧上海“三大亨”之一张啸林建于1934年的公馆。当年张啸林造这幢别墅时，最初是打算送给军阀林永祥的。后来因为其他一些原因，他留作自用了。所以，这幢房子选址时，特别讲究风水和地理位置。如今，沿着盘山公路从大门进入，花十来分钟时间，走过四段茂荫覆盖的山道，不经意间，会突然发现自已已置身山巅了。站在林海别墅的大阳台上放眼望去，前方峰峦叠翠绵密蜿蜒，大风鼓起脚下降阵阵竹涛。是夜，我们坐在“百忍堂”前喝茶赏月，只见古树苍虬，青气薄烟。再极目远眺，则是一片星星点点的灯海。同去的亲友告诉说，这就是武康镇了——莫干山所属德清县县政府的所在地。这里的风景真是无边啊！

前几次来莫干山游玩时，看了不少老别墅，知道1954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制订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，曾在莫干山上休憩过，留下了一首《七绝·莫干山》。1937年3月，周恩来在莫干山白云山馆内与国民党进行了第二次合作谈判。蒋介石在莫干山上度过蜜月，1948年7月还与幕僚在此商讨过币制改革。至于其他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在老别墅里留下的“往事”，更是指不胜数，曲折绕肠。如今，那些多年锁在深闺高墙内的历史记忆，可以让游客触摸和评注，普通老百姓在莫干山上可以随处看“风月”了。

福岛，名字蛮萌，有福之岛。有关“福”字，据说古时有个傻瓜儿子，过年挂春联，上下左右分得清，但却把大门正中央的“福”字，贴倒了，惹得前来拜年贺喜的亲友和路过的行人，看着尴尬不无忌讳地轻声提醒：福，贴倒了！倒是这家老爷子，坦荡荡，大声回应：是，福倒了啦！如此一吼，忌讳尴尬全无，彼此笑逐颜开，还讨来口彩。还有一说是，原本就是老人家玩的幽默把戏。不管原委真实如何，反正从此往后，家家福字倒贴，人人喜闻乐见，成了一道喜气养眼的过年风景线。

福岛，在日本。虽不如东京北海道有名，但作为日本的第三大县，以及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古迹的旅游资源，人气也不差。春天里，三春洗樱，千年树



来，只要理解了，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就好。其实啊，媒体就是一座桥，架在专业工作者与业余听众之间；记者就是穿针引线的中间人，用能够让读者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，才能真正起作用。”周先生专攻声乐，这番话虽是聊家常般边笑边说，语气很轻松，却包含着很多道理，让我在数十年新闻工作中，受益匪浅。

我写过周先生的很多报道，其中最多的，是她与她的学生们。周先生与魏松、廖昌永、张建一、张峰、于冠群等等歌唱家的师生情，自是众所周知。在采访中，深感她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，甚至有一种“护犊子”的执拗。有一次，张峰举办独唱音乐会，由于被人安排成一首歌献一次花，我写了批评报道。周先生看到报纸，马上打来电话，依然是笑呵呵的语气，说的却是青年人才是社会的财富，媒体要对他们多呵护。后来与廖昌永说起此事，他深有同感地说：“是啊，先生对我们很爱护，只要有事，她都会亲自站台。但是，每当我们开独唱音乐会，先生总是要把我们叫到家里，一台音乐会的曲目要唱上几遍，一句一句地把握满意了才让我们到剧场去演出，管得严着呢。不过，她身上总有一种精神在感染我们，所以，大家都愿意。”

对门下学生爱护有加，对师出别门的年轻人，她也总是心胸宽广地敞开门。石倚洁到沪时，对我流露出向周先生求教的想法。他的声乐起步虽得到廖昌永、魏松的指导，却一直在国外学习，因此又不敢冒昧登门。想想周先生平时从不拘泥于门户之见，所以，我马上就与周先生联系，她非常干脆地回答：“来吧。”那一次，周先生弹琴，石倚洁演唱，一曲《魔笛》咏叹调《多么美丽的肖

海夏磊看福岛的”特别节目，在3月9日到11日的上视新闻综合频道《新闻夜线》节目中，连播三天。

如何看福岛？十人十色，仁者见仁。也许我们最多打声招呼，像去串门道声问候一样。至于核泄漏是否还有，核辐射会带来多大危害，仅靠一周的采访，肯定是看不透的。换句话说，与其让我们看客去探究明理辨别真伪，还不如让日本自己来解答。毕竟，时代已不同于30年前的切尔诺贝利的核电泄漏。如果日本政府能对针对核泄露核辐射的应急预防中，总结出服务于全人类的“核解大纲”，拿出一套值得参考借鉴的“核对范本”，岂不是坏事变好事，造福全人类了么？毕竟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核啊。与其忌谈谈“核”色变，不如笑谈“核去核从”！

如此一来，就像福字倒贴：福岛，福到了。

夜光杯

乔迁新居，寝室和客厅的面积是大了，但我的书房却“缩水”了。原来容得下六个书橱的书房，现在只得摆放三个，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书橱将忍痛割爱，被“清门入户”。

面对累累的书堆，我陡然焦虑、犹豫，不知取谁留谁。但清除一部分是毫无疑问的，恰如近来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火的词：“断舍离”，舍弃那些并不需要的书籍，正是为了使那些亟需的书籍得以保存，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真是印证了佛家所言：“有舍才有得”。

检视我的藏书，大体有这么几类：一是工具书，如各类字典、辞典、书目录；二是中外名著；三是大量的杂文选集和杂文家个人文集；四是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作家文集；五是文史哲杂书；六是名家所赠送的签名本，如冯英子、何满子、陈学昭、拾风、钱君匋、秦牧、赵清阁、罗洪、洪伯吹、柯灵等，这些都是当年我采访时所得。

经过重新整理后，那三个书橱作了较为明确的“分工”：《资治通鉴》《续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鲁迅全集》及一些工具书放一橱；名家签名本和现代文学史及现代作家文集、杂文书籍放一橱；另一橱全然是文史哲杂书。这样的“分工”井然有序，便于我检索。“简单”带来的是“明

像”逐字逐句地“过堂”。我在旁边录像，一个多小时下来，周先生毫无疲倦之感，还说了很多鼓励的话。石倚洁收到我给他的录像时很激动，他说：“这是最为珍贵的记录，将会影响我今后的歌唱生涯。”

尽管与周先生的交往，经常是有采访的动机，但时间长了，结下了深厚的忘年之交友谊。因此，应先生之邀，参加过她的88岁生日聚会，还一起吃过年夜饭。有一年春节去她家拜年，那时她还住在复兴西路的洋房里。弄堂里很冷清，推开她家门，却是热腾腾的气氛扑面而来，一看都是上音的学生，正围在电视机前对着春晚的录像，听周先生分析点评。在学生们中间，周先生笑颜绽开，变得性情率真，顿时年轻了好多。印象尤为深刻的，是那次数与《黄河大合唱》词作者光未然相隔60多年重聚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光未然组织拓荒剧社在武汉宣传抗日，因周先生弟弟周德佑是剧社成员，因此经常到周家。那时，周先生还年少，但对这位志向远大的地下党员深有好感，常常参与他们的聚会。但后来，光未然北上延安，周先生

赴法留学，从此音讯相隔。这次重逢，周先生又如当年的那个“小妹妹”，一脸问号，好奇地问这问那，光未然则似“大哥哥”，很多周先生的父亲周苍柏暗中资助共产党人的往事，被他娓娓道来。我听到的内容写成了通讯《“大哥哥”与“小妹妹”》刊登后，周先生还开心地对我说：“我还是小妹妹吗？老太婆喽。”

2005年，周先生以88岁高龄，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。那段时间，报社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，希望转达对她的敬意，而她正在忙于一台优秀学生音乐会的筹划，实在抽不出空来一一回应。不过，音乐会一结束，她仍然亲自写了《答新民晚报读者的信》（刊登于2005年6月20日一版）。

虽然先生已远行，但她瘦削的身体散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，永存在脑海当中时时浮现的音容笑貌里，激励着她的学生、同行和许许多多的人。

卖书记

沈栖

了”，现如今我查找急需的书，反而比以往方便快捷了。但内心还是常有隐痛，因为被清理的那一半书，毕竟也伴随着我度过了几十个春秋，有些还是我学生时代的启蒙书哩！

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还在读高小时就喜欢读书，我买的第一本书就是《雷锋日记》。“文革”期间书店荒芜，除了一些政治书籍（多为教条），几无文艺名著，我购买的第一批书便是《九评》《列宁选集》之类。改革开放后，出版界繁荣，我购书也繁忙，有时竟将一个月的工资全花在了买书上。书中的知识清楚地照见自己的浅薄，一个劲就想多读些书，不断充实自己。在年轻的时候，读了几本书懂了一些知识，发表了几篇文章，确实有些飘飘然，随着阅历的增长、经历的磨砺，尤其是1980年入读华东师大夜大学，才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。三四十岁，是我买书、读书的高峰期，同步的是创作也进入了巅峰期，进而忝列上海市作协，俨然成为一名作家。

曾记得，逛一回书店，惊一回心。哇塞！又有一些新书上架了。可上回上上回买的书还没看完，有的甚至尚未翻动过呢。就这样，书的存量越来越多，看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，这回卖掉的书，相当一部分是新的“旧书”，从未目染。当年思付：“有的是时间，以后再看吧”，其实，这是自欺欺人呵！

卖掉的还有大量过时的书籍。所谓“过时”，指的是观念陈旧、思维老化、不合时宜的书，主要是那些现代文学研究著作。我一度热衷于现代文学研读，还写过不少论文，出版过《林语堂散文赏析》一书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几乎是见到此类书就买下，觉得“自有自方便”，光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我就收藏了不下10种。现在读来，一是雷同化，二是明显落伍，再说我已“移情”于杂文创作，对这类书少有顾及，留些代表作，其余一概清除之，足有满满的一橱。

“千秋邈矣独留我，百战归来再读书”。这副对联是曾国藩送与其九弟曾国荃的。倘将“百战”改为“退休”，极合我况。我将以余生尽可能地读留存下来的那些书。

最后，我要郑重地说一句：三橱书卖掉获利：108.88元。我惊诧且忧伤，为那些书的身价“低贱”。



居家小区电动车电瓶连接被盗，物业公司接报后，当即在小区各居民楼张贴“告示”，提醒业主警惕。事隔数日，小区又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，造成人心惶惶，业主们对物业疏于管理皆十分不满。

眼下，一些小区治安状况不理想，盗窃案频发，除了部分业主防范意识不强外，与物业管理上少作为、不作为有直接关系。有的物业单位接到失窃投诉，既不分析原因，也不查找漏洞，通常只在小区醒目处贴一“告示”，提醒业主注意防范便万事大吉。这种以“告示”替代管理的做法，是导致盗窃案多发的重要原因，也是引发业主与物业矛盾和纠纷的一个焦点。

诚然，物业贴“告示”提醒业主，避免财产损失，也是减少失窃的一种举措，问题是物业不能将防窃责任全部推给广大业主，自己却不尽筑漏堵洞之责。有些小区警卫工作时，喝茶、看报、聊天，对进出小区的陌生面孔从不过问，形同虚设；有的小区明知监控设备失灵，却迟迟不予修复；有的小区夜间巡逻时时有时无，断断续续；还有的小区晚上照明昏暗一片，咫尺难辨人影……这些管理上的疏漏与缺位，往往给了不法分子以可趁之机。更让人郁闷和不解的是，一些案件告破、漏洞暴露后，有的物业却仍强调客观，不思整改，以致小偷再次作案毫无顾忌。

安居才能乐业，平安才能和谐。物业单位不能只收费、疏管理，不可以贴“告示”替代管理。要切实负起责任，采取有力措施改进管理、完善服务、强化防范、堵塞漏洞，积极回应业主呼声、期盼，这样才能降低小区案发率，赢得业主的信赖。

莫用『告示』代管理

阿文

灯花



现在那种朝花夕拾的同学聚餐真多，形形色色，拉动了消费，拉动了原生态的生活感情。

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一家机械厂工作，结识了很多工友。这是一次我们五十年后的聚餐，退休聚餐的都是1965年厂办半工半读的学生，后来都成了工厂的老师傅，我是67届，例外地受到邀请。

现在他们都是老大爷、老大妈了。与我不同的是，他们原先都居住在淮海路、南京路，上只角的，祖上出身都不一般。由于特殊的原因，他们中的大部人生活经历变得很坎坷了。

同事聚餐，没有喧哗，也少烟酒，举止雅致，大家静静地交谈一些生活的平常事，没有那种微信里常人喜欢讲的哲学家的段子。我十分喜欢聚在那儿，聚在平静处。大约太静了，我建议能歌者唱一曲，唱的是《夕阳红》。

歌词与他们的生活虽然不一致，但是曲调很协调。他们那时都年轻，曾经播种的爱情没有得到收获，曾经努力学习却没有考取大学，曾经的爱好没有成为职业。大家互相平平安静，互致礼节，只拍了一张集体照，我取名为“同气之光，五十初度”。

